

中國文化叢書

第二輯

中國教育思想史

下

任時先著

主編者  
王雲五  
傅緯平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中國文化叢書

第二輯

中國教育思想史

下

任時先著

主編者  
王雲五  
傅緯平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

## 第十章 清代的教育思想

### 第一節 清代學術思想的轉變概要

#### (一) 清代學術思想轉變的原因

清代學術思想轉變的原因，最重要的有兩點：第一、民族思想的興起。第二、宋、明理學的缺點。現分論之。

(甲) 民族思想的興起 蒙古族自統一中國後，漢民族精神，喪失殆盡，教育衰敗達於極點。明太祖起，始恢復漢族，其於民族復興之功績，當然是永垂千古，但是，文化教育的建設，毫無成績，社會思想囿於理學，失之空疏，一般智識份子多散漫不振，以致民族精神仍悶鬱不復開展。及至晚年盜賊蜂起，外族乘機內侵，於是明朝在內外夾攻之中一敗塗地而不可收拾。

明朝雖亡，但是民族思想反有興起之勢。當時民族思想賴以維持不致中絕，其唯一原因是明朝的遺老如顧炎武、黃宗義、王夫之等努力的提倡。他們目覩復族不久，又遭亡國之禍，不用說是很痛心的，一面統率明朝遺留的義師抗清，一面著書立說，鼓吹民族思想。在鞏固民族思想的戰綫上，首要肅清反動的思想。明末所謂的反動思想是什麼？無疑的是宋明理學。如顧炎武根本不承認有理學，痛詆理學的空疏，揭出擁護民族思想的大旗，大聲疾呼。他說：「劉石亂華，本於清談之流禍，人皆知之，孰知今日之清談，有甚於前代者；昔之清談，談老、莊，今之清談，談孔、孟，未得其精，而已遺其精，未究其本，而先辭其末。不習六藝之文，不考百王之典，不綜當代之務……股肱墮而萬事荒，爪牙亡而四國亂，神州蕩覆，宗社邱墟！」（一）又如王夫之說：「述古繼而王者，本軒轅之治，建黃中，拒閒氣，殊類之災，扶長中夏，以盡其材，治道該矣。」（二）又說：「可禪可繼可革，而不可使夷類間之。」（三）這些都是顯明鼓吹民族思想的史料。理學思想受了這樣嚴重的攻擊，而本身的缺點又多，自然不能繼存。

（乙）理學的缺點 關於宋明理學的得失，在上章第九節中已略為批評了，其功績在能將

四書、五經中每個重要問題，特別提出作精密的研究，發現許多前人未盡的至理。其缺點在使學者偏重於性理的空疏研究，結果養成智識份子的「束書不觀，游談無根」的惡習，毫無救國的勇氣和實際的技能。民族精神，因亦頹敗已極。理學既有如是的缺點，其不能維繫社會的信仰，實是必然的。何況清初，正當晚明王學極盛而敝之後，具有民族思想的學者如顧炎武等遂大倡「舍經學而無理學」的主張，使學者脫離理學的羈絆而直接反求之於古經。

理學雖有儒家的思想爲其理論的基礎，但失之空疏，毫無實踐的方案可尋，亦無濟於事。因此之故，理學剛演至明末，遇着民族變遷的刺激，便崩潰無遺。

## （二）清代學術思想轉變後的概要

清代的學術思想既有轉變，其轉變的概況究竟如何呢？梁任公先生說：「清代思想果何物耶？簡單言之，則對於宋明理學之一大反動，而以「復古」爲其職志者也。」（四）準此，我們知道理學崩潰後，清代思想界遂生一種反動，即是採用漢儒治經的方法，竭力於考據與訓詁。漢學之名，遂由此出。經學爲什麼要考證訓詁呢？因爲，經學有真有僞，須加以考證辨別；文字有古今的分別，要明白

古經的意義，非加以訓詁不可。在清初，閻若璩首先揭出辨僞經的主張，喚起「求真」的觀念，胡渭攻「河洛」(五)掃架空說之根據，於是漢學的規模大備。惟考證訓詁，首在方法，當時的學者亦能注意及此。他們所努力的目標是理論的檢討，史實的證明，其根本方法還在「實事求是」，「無徵不信」。至於研究的範圍，除經學而外，亦涉及小學、音韻、史學、天文、地理、算學、典章制度等。再者，清代思想受宋、明理學的反響，而產生復古（漢學）的趨向，所以史家多以歐洲的「文藝復興」相類比。這種論斷，在清代思想產生的時代性及內容方面說，是能成立的，不過歐洲文藝復興的結果與清代文藝復興的結果是兩不相同的，這點我們須得注意。

梁任公先生將清代學術思想分成啓蒙、全盛、蛻分、衰落四期：啓蒙期以顧炎武、胡渭、閻若璩爲其代表，全盛期以惠棟、戴東原、段玉裁、王念孫、王引之爲其代表，蛻分期以康有爲、梁啓超爲其代表，衰落期以俞樾、孫詒讓、章炳麟爲其代表。這種分法，對於思想的研究，頗多方便之處，實亦不可忽略的。惟康、梁、章諸人的教育思想我已劃入於近代時期。本章所述僅啓蒙與全盛兩期而已。

## 第二節 清代教育的方針

清以滿族統治中國，在政治上除竭力實行君主專制外，最要緊的是防止異族的反動。在文化教育上更注意於行政的統制，思想的束縛。清代的教育方針是根源於建國的策略而來的。建國的策略是什麼？即是以鞏固滿族的統治基礎爲本，而以保存民族固有的道德技能，發揮其民族特質之勇氣，期使滿族之精神文明得以永存能與異族相競爭。因之，他的教育方針純粹本於滿族利益的立場上，對漢人施行統治教育，其主要方案在籠絡士子與利用士子以吸收漢民族的文化。戴季陶先生著有清代教育方針一文，簡明扼要，茲摘錄其要點如下：『第一、對滿洲人之教育，爲清代教育之主。蓋彼之所謂建國者，建滿洲人之國也。例之堯典，彼蓋視滿洲人爲百姓，而視漢人爲黎民，對百姓則欲其昭明，而對黎民則僅欲其各安生理，毋作非爲而已，用心之不同如是也。至關於滿洲教育之可得而言者，約有數端：（一）教育方針在於先實行而後文藝，以植綱扶綸爲本，以經史致用爲要。以弧矢之利威天下，不汲汲於敷華馳藻，而文運彌隆。故事事求實際，尙樸實，重節儉，嚴紀律。以

文爲體，而以武爲用。學校教育不分文武，國家考試亦文武并行。職司有文武之分，而教育無文武之別，此其要也。（二）民爲國本，地爲民用。故以人民之組織，爲國家組織之基礎，以軍事之組織，爲人民組織之標準。民與國爲一，兵與民爲一，而教育卽行於其間……（三）國家考試，自文童以至於舉人會試，皆以騎射爲甄錄之科目。馬步弓箭不能及格者，不得應任何考試……（四）保存民族固有之道德技能。視滿洲言語、文字、風俗爲立國根本。以數十萬人加入數百兆人中，實效幾等於零，尙極力保持，不令失墜。此點事實上終歸失敗，然其建國之精神，實堪嘉善者也。其他於宗教於道德，無處不發揮其保存民族特質之勇氣。宗教尊西藏，而民德不爲所同。學術宗中國，而民風不爲所化。此爲順康、雍三代百餘年建國之大方針……第二、對於漢族及其他民族之教育……清之初葉，雖處此種困難情勢之下，建設規模，仍有足觀者，對於滿洲民族，力求獨立，保持固有誠樸武勇之精神，不令受漢族文弱士風之影響，既如前節之所述矣。而對於漢族之教育，亦不能謂其較明代爲尤劣。其最足稱道者，亦有數端，爲漢、唐以後之特色，試略舉之。（一）確立社會道德之基礎，以心性與行爲，合爲一致。一切教育皆以爲準繩，此卽康熙所頒之十六條上諭是也……（二）主教之官，於學

校教育之外，應負社會教育之責。……清之宣傳政治，實以教官爲主要之宣傳員，教官之任用，亦以宣傳之勞績爲一要件。康、雍兩代之教條，其所以能若斯之普及者，實運用教官宣講之法認真所致也。……其宣傳之法則，以十六條六訓爲本，於解釋條文之後，就其條文，引故事以證之，有唱有白，入情入理，當時平民所受之教僅此，任之私塾之師生是也。……（三）對於開化蠻夷與保護此種弱小民族之政策，其現於教育上者頗多，如限制考試之競爭，卽其一也。……」（六）

### 第三節 反對理學與科舉的思想

清代學術思想既爲宋、明理學的反動，則其反對理學的思想必爲當時學者所同具，這是毫無疑問的。科舉制度至清已達登峯造極的階段，其流弊之大亦爲前朝各代所共有，因之，以往各代的通儒均持反對之論。這種反對思想至清代不但爲諸儒的共有，且因科舉制度厲行的反響，愈增加其激烈性，真是「魔高一尺，道高一丈」！反對理學是屬過去的，反對科舉是屬於當時的。此兩種反動思想，對於清代以及現今的教育思想關係至鉅，所以有先行提出論述的必要。

## (一) 反理學的思想

清初對宋明理學首施猛烈攻擊的爲唱「通經致用」「博文知恥」的顧亭林，他根本否認理學的存在，所以他說：「古今安得別有所謂理學者，經學卽理學也；自有舍經學以言理學者，而邪說以起。」（七）理學的不重實際，不重品行，至晚明猶極，當時的「狂禪派」所謂的「滿街皆聖人，酒色財氣不礙菩提路。」（八）真能代表一時特殊的士風。因此之故，顧亭林對王陽明攻擊尤烈，他說：「今之君子，聚賓客門人數十百人，與之言心言性，舍「多學而識」以求「一貫」之方，置「四海困窮」不言而講「危微精一」，我弗敢知也。」（九）又說：「今之學者，偶有所窺，則欲盡廢先儒之說而駕其上；不學則借一貫之言以文其陋；無行則逃之性命之鄉以使人不可詰。」（一〇）又在日知錄上說：「以一人而易天下，其流風至於百餘年之久者，古有之矣。王夷夫之清談，王介甫之新說，其在於今，則王伯安之良知是也。」

次之，排斥理學的爲王船山。他說：「體用一，知行合，善惡泯，介然有覺，頽然任之，而德明於天下矣。乃羅織朱子之過而以窮理格物爲其大罪，天下之畏難苟安，無所忌憚，以希冀不勞而坐致聖賢

者，翕然起而從之。』(一)又說：『侮聖人之言，小人之大惡也……姚江之學，橫拈聖言之近似者，摘一字一句以爲要妙，竄入其禪宗，尤爲無忌憚之至。』(二)

對於理學從理論上加以批評的，還是顏習齋、李恕谷二人。顏、李二人代表的是唯生主義，所以對於理學的批評，較顧、王諸人都來得深刻。

(甲)對理學總的批評 顏習齋說：『宋儒如得一路程本，觀一處，又觀一處，自喜爲通天下路程，人亦以曉路程稱之，其實一步未行，一處未到。』(三)又說：『余昔尙有將就程、朱附之聖門支派之意，自一南遊，見人人禪之，家家虛文，直與孔、孟敵對，必破一分程，朱始入一分孔、孟，乃定以孔、孟與程、朱判然兩途，不願作道統中鄉愿矣。』(四)清代學者痛心宋、明學者以『儒表佛裏』治學，使儒家的正統混亂，故有以斥之。

(乙)對於『主靜』『居敬』的批評 『主靜』是宋儒所共同承認的教育方法，但顏習齋卻甚反對，他以為即使靜到『鏡花水月』的地步，亦是無效的。他說：『洞照萬象，昔人形容其妙，曰鏡花水月，宋、明儒者所謂悟道，大率類此。吾非謂佛學中無此境地，亦非謂學佛者，不能致此也，正

謂其洞照者無用之水鏡，其萬象皆無用之花月也。」（一五）靜坐不但無實效，而且妄惑已極！他說：「天地間豈有不流動之水，不著地，不見泥沙，不見風石之水，一動一著，仍是一物不照矣。今玩鏡裏花，水中月，信足以娛人心目，若去鏡水，則花月無有矣。卽對鏡水一生，徒自欺一生而已矣。若指水月以照臨，取鏡花以折佩，此必不可得之數也。故空靜之理，愈譚愈惑，空靜之功，愈妙愈妄。」（一六）靜的工夫不但無用，而且有害。這害是什麼？卽是他說的一是身體的害，一是神智的害。他說：「終日兀坐書房中，萎靡人精神，使筋骨皆疲軟，以至天下無不弱之書生，無不病之書生，生民之禍未有甚於此者也。」（一七）又說：「爲愛靜空譚之學久，則必至厭事，遇事卽茫然，賢豪且不免，況常人乎？故誤人材，敗天下事者，宋人之學也。」（一八）的確空靜實足以傷身損神，中國人民受這種遺毒甚深，以致身體文弱，神智不旺，影響於民族前途至鉅。習齋雖揭破空靜的危險，但不爲當時人所注視，鮮生效果，殊爲可嘆！

宋儒言居敬必須與事物脫離，顏李以爲居敬不可與事物脫離，這是與宋儒所說的大相抗庭的地方。顏習齋說：「曰「執事敬」，曰「敬事而信」，曰「敬其事」，曰「行篤敬」，皆身心一致加

功無往非敬也。若將古人成法皆舍置，專向靜坐收攝徐行緩語處言主敬，則是儒其名而釋其實，去道遠矣。」（一九）李恕谷亦說：「聖門不空言敬。」（二〇）

（丙）對於「道」「理」的批評 「道」「理」二字卽是「明道」「窮理」的意思，宋儒每以道理合而爲一物，運用於宇宙本體論上解釋，則有近於老子的「有物混成先天地生，名之曰道。」運用於倫理上解釋，卽是格物窮理；因爲能窮理，則道自明，能順理而爲，自然合道。顏、李言道（二一）則不然，以爲道不能脫離現實，所謂「道不遠人」就是說道卽在人事之間，不能超出五倫六藝而外，所以人必須於現實事物中來研尋道，若捨此而求之他，實是空談。顏、李解釋道既認不能離人事而言，則對於理的解釋不言亦知。他們是反對朱子的「豈有見理已明而不能處事者？」的主張，而以爲必須於處事接物中窮理；因爲若捨窮理於現實之中，其結果必陷於理論與實踐相矛盾的境地，所以習齋說：「見理已明而不能處事者多矣。有宋諸先生便謂還是見理不明，祇教人再窮理，孔子則祇教人習事，迨見理於事，則已徹上徹下矣，此孔子之學與程、朱之學所由分也。」（二二）

吾人綜觀顏、李對於宋明理學家的「敬」「靜」「道」「理」的批評，可知道他們理論相

異的基點實是「唯生」與「唯心」上的區別。顏、李本於「唯生」的立場，根本反對空靜工夫爲教育方法，主張「敬」必須「敬其事」，「行篤敬」，主張「道」「理」須於現實事物中去研尋，不可脫離事物而空言「道」「理」。

### (二) 反科舉的思想

反對理學是清代思想的第一個革命，前文已論其大略。至於反科舉的思想，是清代學者承繼前人的獨見精神而加以繼續不斷的努力。兩者在清代學術思想史上，都有光榮的地位。

清代反科舉最早的爲顧亭林。他反對科舉的理由是：第一、科舉制度不能取得真人材；因爲，應科舉考試的士子，大多爲的取富貴，弋名譽，真有學識的人不一定出於科舉，所以由科舉出來的多無實學。第二、科舉阻礙真知的研究；因爲，科舉既以八股文爲取錄之標準，則一般士子多聚精會神於八股文的鑽研，以爲祇要做幾篇漂亮的文章，便可以登科考試，對於真實學問的研究，則置之腦後。亭林所謂的真知實學，當然是指古時的典章文物，經世致用之學了。我們姑無論以前的經典是否就是真知實學，但是，科舉制度之興，確是學術思想上的惡魔，所以他說：「八股之害等焚書，而敗

壞人材有甚於咸陽之郊。』(三三)

黃梨州反對科舉較顧亭林爲澈底，他痛斥當時科舉取士之弊說：『取士之弊，至今日制科而極矣；……條舉之法，雖曰以名取人，不知今之所謂名者，何憑也？勢不得不雜以賄賂請託；……欲得勝於科目之人，其法反不如科目之詳，所以徒爲紛亂而無益於時也。』(三四) 他主張取士從寬，用士從嚴；因爲寬於取，可免枉材，嚴於用，可少倖進。至於取士方法，當然不一定採用科舉，所以他又說：『古之取士也寬，其用士也嚴，今之取士也嚴，其用士也寬；……寬於取，則無枉材，嚴於用，則少倖進；……嚴於取，則豪傑之老死邱壑者多矣。寬於用，此在位者，多不得其人也。』(二五)

#### 第四節 啓蒙期的教育思想

##### (一) 顧亭林

(甲) 教育的目的論 顧亭林是清初努力於民族復興運動的學者，他目觀明朝亡國的情形，深悉亡國的原因，立志要圖恢復明社，四方奔走，以復興民族，擾亂反正爲己任。他主張教育的目

的是在使人有「致用」的能力；因為復興民族，不全是理論的問題，而是實幹的問題，如果不言「致用」之學，試問造成像宋明那些「弱不勝風」「放言高論」的人，即使有救國之志，然亦無補於事。他認定「天下興亡，匹夫有責」的信念，遂提倡「致用」之學，這是他論教目的出發點。要救國必須造成一批有用的人材，這種人材非尋常人可比，必具備幾種條件：第一是智識的豐富實用。如他的學問可以墾田，教人理財。第二是志操清高。如他謹遵母親遺訓不事滿清，以恢復明社爲己任，其志節之清高，非常人所及。第三是意志堅強。如他四方奔走，艱苦備嘗，但一點不灰心，不與世俗同化。要能達到這種教育目的，必須實踐他的教育方法。

(乙)教育的方法論 顧亭林對於教育的方法提出兩個實施原則：一是屬於智識方面的「博學於文」，一是屬於品行訓練方面的「行己有恥」。

第一、「博學於文」的意義及其實施節目 他所謂的「文」是宇宙間一切事物的現象，如說：「自身而至於國家天下，制之爲度數，發之爲音容，莫非文也。品節斯，斯之謂禮。」(二六) 又說：「夫子之文章，無非夫子之言行與天道。」(二七) 「博學於文」又有什麼意義呢？博是廣博的意